

酷兒理論與政治

痛之華——五零年代國共之間的變態政治 / 性想像

趙彥寧

壹·無限延遲的返鄉

如眾所知，1945年後國共內戰隨著中日戰爭的結束而日趨熾熱。今日僅由當時報紙的新聞報導¹，便可窺知自國共內戰進入第三年的1948年中起，幾乎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國民政府便崩潰似地喪失其在中國大陸的統轄領域。國共會談雖於1945年八月的重慶在中日戰爭停止後迅即展開，但隨著1946年三月國共於東北激戰之後，軍事武裝的衝突便開始大規模進行；而當年七月在國民政府挾五十萬大軍對中共蘇皖佔領區進行總攻擊、而毛澤東隨之以「保衛戰」為名宣佈正式交戰之後，全面內戰便開始了。1947年中諸如南京、天津、北京等大都市居民對國府政經政策之不滿主要尚經由學生日趨激烈的反內戰、反飢餓示威傳達²，但在1948年年底，距南京國民政府公佈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過半年，人民解放軍便已連串地「解放」了濟南（九月二十四日）、長春（十月十九日）、徐州（十二月一日）、及中國古來北方的行政中心，北京（1949年一月一日）。蔣介石雖緊於其後（一月二十一日）引退，

¹ 見，如台灣史料編纂小組（1993）。

² 知名的「五二零慘案」便是在國府大力鎮壓學生示威的情況之下所造成的。

但此政治動作顯然對挽回國府軍事之頹勢無明顯助力。1949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毛澤東與朱德的總攻擊令發動下，共軍順利渡過長江，並在其後一個月內佔領了中國南方的兩個首要都市，南京及上海。

雖然國府在首都淪陷後緊急遷往廣州（以及其後的重慶），但顯然不論對國府、抑或中共而言，中國「全面解放」的事實多少已被視為必然——莫論前者是否願意接受、亦莫論此時刻究竟將於何時到來。但或許對中共領導者而言，如此迅捷的勝利亦令人驚異。毛澤東（1977）於1949年九月二十一日「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馳名的開幕致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開宗明義地表達了這個情緒：「在三年多的時間內，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美國援助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所有的數百萬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反攻和進攻。現在，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的野戰軍已經打到了接近台灣、廣東、廣西、貴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區去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已經獲得了解放。」而在國府這個快速的潰敗過程中，台灣作為日後將近四十年「反共堡壘」的實質與象徵位置亦逐漸形成：1948年南京國民大會通過提案，確定將建設台灣為「自治模範省」；1949年四月底解放軍渡過長江後，大批國府要員、家屬、商賈紛紛搭機來台，蔣介石本人亦於五月二十六日飛抵高雄壽山，其「總裁辦公廳」於一個多月之後便在台北草山設立；緊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十月一日建國，中華民國政府亦於十二月七日正式開始在台北辦公，而在1950年一月一日蔣介石發表「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以前所未有的沈重口吻聲明「反攻到底」、且於二個月後復行視事之後，隨著當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的展開與冷戰的爆發，台灣作為一個本質無限延遲（forever-deferred）的反攻／返鄉

行動準備地這個意義亦快速地被確立了。

台灣在如此一個政治的象徵秩序中因而被賦予了某些特殊的時間與空間特性³，如前此所謂「無限延遲」的時間性（temporality）、永遠震盪於隨時欲發但亦隨之收斂之間的行動警覺性⁴、及以一「彈丸之地」⁵涵蓋所有「海內外中國社會」（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本島、金馬等軍事基地、以及「海外僑胞」）的一種不斷向外輻射的空間性（spatiality）⁶。筆者認為這些時間—空間（time-space）特質不僅相當程度地左右了五零年代國府在台灣重塑其國家權力機制的方式、亦影響了許多中國流亡人士對自我、現實、對過去的反思及未來的實踐與想像基礎。而在另一方面，前引毛澤東於「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並合法化其國家機器組成的關鍵

³ 關於這些特性（包括前此所謂「無限延遲」這項時間性）、及其對某些流亡個人於五零年代對自我、台灣、與流亡的認識論形塑之影響，可見筆者稍早的研究論文（趙彥寧 1998a）。

⁴ 筆者認為這個警覺性併合著其他感知及認識論因素——特別為塑造一無時無刻均需被體察及搜索到的、但本質不具形色卻又無所不在的「敵人」——在戒嚴時代的四十年中成為許多重要的認知系統的形成基礎，其中包括所謂的「憂患意識」。

⁵ 「彈丸之地」顧名思義一在指其「幅員甚小」，二在藉由「彈丸」內蘊的爆發力與殺傷力以合法化台灣做為「反攻基地」表面矛盾但實質必要的特殊性，即，此小格局的幅員之地正恰恰好成為「反攻彈丸」激射的唯一來源。

這個名詞廣見於五零年代官方與流亡者的敘事中，亦出現於筆者田野調查受訪者的言談裡。此田野計畫自 1998 年七月起正式開始進行，依附於筆者 1998-2000 年之二年國科會計畫案下，受訪者為 1949 年前後依隨國府流亡來台的大陸人士，至本文寫作時期（1998 年九月初）已有四十餘人接受訪談。

⁶ 關於此向外輻射的空間性與中國近代以降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及漢人親屬價值系統之間的可能關係，可見趙彥寧（1998b）。

性會議)的開幕詞中也指出了一項事實,即在當時的軍事想像空間中,恐怕不論對中共、甚且對國府,台灣如同兩廣、新疆等地區一般不僅於軍事行動上為一「邊緣地帶」(但因而遲早可被收編入毛於此文中所理解的「全中國」⁷),亦為一特殊的「文化異質」所在⁸。筆者認為台灣於此想像空間中併合著前述之時間—空間特質以及其被賦予的文化異質性,更加促發其作為中國流亡人士(不論國府人員抑或莫名所以隨之播遷來台者)對今昔、他我的認同與想像基礎。

貳·不斷追悔中的感官經驗

姑不論國民政府在大陸政權的崩潰是否源自其自我的結構崩解

⁷ 「我們的會議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著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國外華僑。這就指明,我們的會議是一個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會議。」(毛澤東 1977) 這段話出現於前引文之前。

⁸ 對中共而言,台灣無法加入前者建國後所「不可避免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毛澤東 1977: 6);對國府而言,台灣的「文化異質性」植基於其五十年的被日殖民經驗中,但此異質性顯然是可以(而且必須)被「矯正」的,而矯正之途則依循國府對「民族國家形成要素」的理解。故,陳儀在 1945 年八月二十九日被任命為台灣行政長官後即聲明治台方針首重教授國語、國文,實行三民主義;當年十月底教育部便派魏建功赴台推行國語教育。

於此須強調的是,若台灣的文化異質性可經由教育途徑而被矯正,則此思考之預設應為其「可被矯正性」必植基於其與國府來台人士共擁的民族國家特質。也就是說,正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台灣與「外省」的融合不僅是可預期的、亦是必要的。這個預設的同時標誌(posit)了與「中國民族國家」對立(且必要存在)的異己,即所謂追隨蘇聯共產國際、枉顧中華民族自尊的中共政權。此異己與「本我」互動的方式在五零年代的公領域中以數種方式出現,其中一種將是下文討論的重點。

(如行政腐化、經濟解體⁹、及蔣介石用兵失策¹⁰等等)，如前所述之國共戰勢的大逆轉顯然是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完成的。於解放軍渡過長江之後的半年期間，國府已三遷行政處，終抵台北，這個流亡的過程且引發了眾及二百萬人由內地至台灣的大播遷，其規模及戲劇化的程度如某些學者所論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黃仁宇 1991)。此流亡的突兀與不可預期性散見大部分受訪者的言談中¹¹，且往往以片段地感官性的修辭比喻(trope)凝聚於其回憶中，一段典型的敘事為：

那個時候我出來也很小啦，那時候是十幾歲喔，好像出來是最後一步了，人心都惶惶的大部分都走光了啦，老百姓嘛我們是老百姓嘛，老百姓的村莊好像燒飯燒柴火啦燒稻草，稻草你懂嗎？那時候老百姓都燒稻草燒麥子燒麥根啦還有蠶豆，蠶豆你曉得嗎？蠶豆根蠶豆穀子蠶豆梗子燒啦燒啦燒啦就說來了來了來了〔指共軍〕，那我們也不懂啦就趕快把火打熄了，就說〔指父母對其說〕軍人逃難我們老百姓在家還是叫他們帶我們出來嘛，就說跟我們出去吧你是女孩子嘛在家恐怖嘛，好像過去日本人沒有人性的樣子就是家裡不好嘛就帶我們出來，本來說帶一下就回家結果就一直逃啊逃啊逃啊就逃到海南島啦...我們也不懂啦，說是來了來了來了也沒有看到什麼。根本就沒有看到什麼。(受訪者甲，原籍漢中。台中大鵬三村，1998年七月三日)

甲對流亡過程僅以押韻式不斷重複的「逃啊逃啊逃啊」表達。

⁹ 僅由當代之回憶錄便可窺知前二者，見，如柏楊(1996)。

¹⁰ 可見，如，黃仁宇(1991)。

¹¹ 本文所引述大部分的田野資料均由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三年級研究生、筆者國科會計畫研究助理孫慧蘭，於1998年六月至十月間經由口訪取得。於此特別致謝。

突乎其來、且緊接時空不斷流轉的逃難過程難以提供甲可辨識、繼而納入記憶的符碼系統，因而回憶凝聚於（始終未能體驗與目睹的）「來了來了來了」之前的那一刻，而這一刻完全以片段的感官經驗被甲理知：「燒啦燒啦燒啦」突然被「來了來了來了」的呼喊聲打斷，被打斷的即為甲原先熟知的認知與分類系統（「燒稻草燒麥子燒麥根啦還有蠶豆」、以及「蠶豆根蠶豆穀子蠶豆梗子」），而這些認知與分類系統乃藉由身體部位（body parts）作為可感知的媒介（如生柴火的手、與乍然聽到「來了」的耳）——而既然是身體部位，這些感知便多為片段、破碎、甚且與語言系統隔離，甚且互相區隔的。對於許多當時隨軍來台的人士（不論被拉伕抑或志願從軍），流亡的回憶表面上以近乎機械式的地點串連呈現（如，「瀋陽失守了，我們就退到北京，再從北京到天津，然後從濟南經過濰縣到青島，再到上海，然後從上海搭軍艦來台灣在基隆登陸」），但這些地點僅提供回憶路線有如地圖般的索引點（referential points），其記憶與追索的情緒仍相當程度地凝聚於感官及身體部位之上。受訪者乙在家鄉湖南省參軍，1949年春自湖南行軍來台，他說：

我出來的時候我是從湖南省 38 年的春天，經過福建廣東。在福建省江西省走路的時候行軍的時候那時候正好有敵軍追趕我們，我們一天幾乎是走八十里以上，從早上到晚上八十以上的路程。部隊是白天走幾乎晚上也在走，在這裡我們唯一的狀況就是閉著眼睛走。當時假如前面發生了狀況，這個人啊無形之中也沒有明講就通通倒下去了，也沒有口令叫我們臥下。這個時候我們在走路的中間，當然我們不可能在那個時候吃飯，我們跟敵人遇到了以後差不多四十八小時沒有吃飯，到臥倒的時候這個人的全身都是軟綿綿的，一點力都沒有，好像這個好像就是說沒有骨頭的啦，起初二十四小時甚至四十八小時不吃東西，

身體有感覺到非常難過的餓.....到了三十九年二月，那個時候淡水不夠，我們在連上就用海水煮飯，事實上這個飯是不能吃的，不是鹹，是苦，可是為了活下去就非吃不可，我們沒有菜吃，可是沒有淡水可是肚子餓又沒有淡水怎麼辦哪，就用海水煮飯，有沒有吃過那個飯？真是...真的是很難下口，那是苦的不說，鹹的，而且是鹹的帶苦的.....至於說從汕頭走到金門我們沒有感覺到遠...在這個中間...因為我們都是大陸人...幾乎百分之八十都是會暈厥的...因為大陸沒有水喝的機會不多嘛...暈厥了以後就會吐嘛...吐苦水，那個吐苦水的味道我們是嚐過的，就是肚子裡頭的東西吐到都灑出來，那個吐到最後的結果可以說是非常之苦的...那個難過的程度別人是沒有的...從大陸上經過江西福建廣東經過浙江到台灣到金門，金門下來以後我們就在哪裡...金門那個時候突然之間增加這麼多兵...那也不可能有菜吃，所以當時我們吃飯幾乎是沒有青菜可以吃的，差不多半年時間就吃今天這個什麼魚啊，就是最差的一種魚啦，就是作肥料的...也沒有什麼米，它都是麵粉...南方人吃麵粉是不太喜歡的，尤其是廣東人他最討厭吃麵，我是湖南省人，我們湖南人吃麵吃的不多，米是主食麵是點心，當時到金門之後早上中午晚上都是那個饅頭...沒有菜吃，就只吃那種魚，那種魚啊我們後來聞都不敢聞，吃到最後這個...沒有菜吃，那個毛蛇線（？）這種東西你知道嗎，我們那個山裡頭堤裡頭找到這種東西來吃...只是味道不怎麼好...還有找那個地瓜葉，那個時候地瓜葉是沒有人吃的....我是很幸運，從這個金門坐飛機坐到松山機場到台灣的。（受訪人乙，台中沈智慧服務處，1998年七月二日）

填滿（fill out）乙近乎機械式的（「從湖南省 38 年的春天，經過福建廣東」、其次「從大陸上經過江西福建廣東經過浙江到台灣到金門，金門下來以後我們就在哪裡？」）敘事之間的，完全為其（有時近乎結巴地）感官性的、幾乎踰越口語再現能力的片段的身體記

憶。這個記憶於大陸行軍時以一種類似全面性的身體感知被乙所認知：「部隊是白天走幾乎晚上也在走，在這裡我們唯一的狀況就是閉著眼睛走」、「到臥倒的時候這個人的全身都是軟綿綿的，一點力都沒有，好像這個好像就是說沒有骨頭的啦」、「暈厥了以後就會吐嘛...吐苦水，那個吐苦水的味道我們是嚐過的」、以及「身體有感覺到非常難過的餓」等；於金門時則凝聚於「吃」的感官過程：「差不多半年時間就吃今天這個什麼魚啊，就是最差的一種魚啦，就是作肥料的」、「也沒有什麼米，它都是麵粉...南方人吃麵粉是不太喜歡的，尤其是廣東人他最討厭吃麵」、「那個毛蛇線...我們那個山裡頭堤裡頭找到這種東西來吃...只是味道不怎麼好...」。感官性的感受能力於流亡過程中竟成為他 / 我的重要分類標準之一：於大陸行軍時全面性的身體感受可藉以分類「我們」與「他們」，而此處的「我們」表面上指「大陸人」，但其實指「以我們這種飢餓的方式來到台灣的人」（「因為我們都是大陸人...那個難過的程度別人是沒有的」）；而僅就麵食的感受而言，乙可（想像性的）再度確立眾流亡者建立於大陸家鄉、但難將於台灣全面重塑的省級分野（「南方人...尤其是廣東人...我是湖南人...我們湖南人...我們」）。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大陸潰守所導致的流亡經歷，不僅凸顯了台灣於「無限延遲」的反攻過程中作為一特殊的時—空想像（及認知）起點之重要性，且於此想像過程中亦同時生產、且合理化了個人於流亡前、及流亡中對人事物的分類架構。筆者認為，往往並隨以上象徵形成與合理化過程而生的，亦為個人追索及反思過往的強烈慾望。如此之慾望可以多種方式呈現，且通常伴隨著強烈的主觀情緒。對不少流亡者而言，其呈現的情緒集中於一「重要之物」上，而此

物為一「喪失之物」(lost object)。與 Freud (1963 [1929]) 的戀物 (fetish) 相同，這些物對主體的價值必須透過「事後重塑」(retrospective reconstruction) 的方式形成，且主體以近似偏執的方式不斷在想像層面上意圖逼近此喪失之物；而與 Freud 的論點相異的，為主體對此戀物的關係多少決定於戀物尚未成為戀物前主體與物的感官關係之上¹²。如受訪者丙所言：

在一些年輕的孩子或是學生像我先生來說，因為大陸很大教育不是那麼普及，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學校，一般到了這個時候〔指 49 年前後中央政府撤退來台之時〕學校整個撤退了嘛，說到哪兒去，到哪兒去，到台灣去，到台灣幹嘛，台灣是個小島對不對，但是他們不了解，那個時候說台灣是個蓬萊仙島，認為台灣就是個蓬萊仙島去玩玩也好，去玩玩幾個月就回來，所以甚至身上都沒有帶什麼東西，我先生身上穿了一套衣服就這樣就來了，到了基隆太熱了，我先生就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換香蕉吃。媽媽手織的毛衣。後來就一直想好後悔喔，自己唯一的紀念品結果把它拿來換香蕉吃。因為在我過幾天就回去了，但香蕉沒吃過。(受訪者丙¹³，台北國軍英雄館，98 年 8 月 5 日)

¹² 在 Freud 的論述中，小男孩未曾真正觸及將來用以「掩蓋」(cover up)「空無」的母親肢體（或母親性器官的轉喻〔metonymic〕延伸，如內衣褲等）。這也就是為何戀物形成的那一刻它永遠僅以影像的方式為小男孩主體所認知的原因。

¹³ 於前引文中表面只描述丈夫撤退來台心路歷程的甲，本人於 50 年中秋節晚隨同家中女性長輩（包括外婆與母親）由當時已「淪陷」的福建搭船，經由馬祖來台。當時甲六歲。逃難當天為中秋節、及其由「淪陷區」而來這個事實顯然對其印象深刻。甲的丈夫來台時尚未滿十二歲，來台初期加入軍中康樂隊。

「後來就一直想好後悔喔」。對丙所目睹的丈夫（且極可能包括丙自己），確定其與台灣此無限延遲的返鄉時—空間互為主體關係之後迅即而生的，便為如前所述幾近不可抑制的回憶／反思活動（「後來就一直想」）；這個認知的過程凝聚於一已失（且幾乎確定永不可復）的戀物之上，而這個戀物（於此例中為母親手織的毛衣）不僅體現（**embody**）了個人的情感，更成為個人思索自我、回憶過去、且興起可被他人理知的情緒（即，「好後悔喔」）的生產中心（**production loci**）。此類感情凝聚／生產之物對流亡主體的形塑同時扮演另一不可或缺的角色：即，非邏輯性的聯結（**conflate**）「流亡前」、「流亡中」、與「流亡後」三個時—空片段中個人所習用的象徵秩序（故包括稍早提及的分類原則）。在丙夫妻的例子中，「無復可尋之物」原先為母親手織之毛衣，其所勾聯個人「流亡前」的象徵與分類秩序由母—子延伸開來的漢人親屬體系結構所代表；「流亡中」的時—空階段令丙的丈夫於莫名所以、所謂無意的狀況中喪失此物（「我先生身上穿了一套衣服就這樣就來了，到了基隆太熱了，我先生就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換香蕉吃」）。但這原先不可想像、無可預知的流亡地情態（「到了基隆太熱了」）在表面上毀壞「流亡前」分類系統之餘、竟亦生產了一全新的主體情感（**affection**）形成基礎（即，無窮的悔恨、不可自抑的追憶、與近乎甜蜜地對戀物的追懷）；而於此一種全新的情感產生的過程中，事後將被不斷記憶之物乃藉由一特殊的交換活動而喪失（即在物質的層面上被徹底的取代），進入此交換活動的「他物」為許多受訪者均會提及的「香蕉」。香蕉這個前所未見之物的出現，不但標誌了主體將進入一全新的象徵交換體系，且藉著「食」的感官經驗將主體帶往終將無限悔恨的情感界域。被交換掉的不僅為「毛衣」，亦為生產此毛衣者（母親）所象徵的親屬機制。在可以肉體關係親

炙的親屬體制被替換的同時，「食用香蕉」的感官經驗亦宣示了「台灣經驗」（半帶暴力性地）的到來¹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原先無可預期的交換活動通常不但為一種幾乎不可解釋的交換慾望所驅動，「食用香蕉」這個嶄新的感官體驗本身往往又啟動（initiate）了一前此無有的耽溺的、甚且是縱慾的「解放」經驗。前引的受訪者乙緊接著前述於大陸行軍與在金門受餓的回憶後，開始敘述他對台灣生活的不習慣，但在這「不習慣」中，香蕉象徵了對無限延遲時一空忍耐的突破及抗拒。他說：

我們看到台灣的景象，在我的感覺啊很淒涼很落後
很荒涼¹⁵，我舉個例子來講，我們看到的房子啊

¹⁴ 於此，值得引述的是受訪者丁的一段回憶。於 1948 年於湖北家鄉被政府軍拉伏後來台，與許多類似背景的流亡者相同，丁的流亡與台灣經驗有如短促間被迫現代化的經驗。「香蕉」則為「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之前沒聽過台灣嘛...到海上的時候才聽到...在新竹湖口下船...哎呀那個時候在老虎口很苦啦...我現在講個笑話不要笑啊，我們在來的一段路穿的那個老百姓的衣服，到台灣衣服就不能穿，就跟那個老百姓啦...那個老百姓穿那個拖鞋、木頭的、扣扣扣，戴一個草帽穿一個裙子在賣什麼，在賣香蕉啦，我講一個笑話啊，在大陸我不曉得什麼叫香蕉啦，結果我就那個褲子沒有用嘛，她要穿，她就給我那個香蕉。那個香蕉，很好看，黃黃的。我拿著就吸都不會吸開，這樣吃啊吃啊怎麼好難吃啊。那個小姐就笑，香蕉要剝皮的，我不懂什麼叫剝皮。這個真是（笑）...我們家鄉沒有香蕉啦。聽的說是香蕉一定很香啦不說要剝皮嘛...我不知道香蕉要剝皮啦...那是第一次...那個賣香蕉的笑死了...（1998 年 6 月 27 日，丁台中寓中）

¹⁵ 必須要強調的是，固然至目前為止多數受訪者對台灣的「第一經驗」（first encounter）頗為負面，但所有源自中國鄉村者卻認為 1949 年的台灣遠較其家鄉富裕進化。受訪者己（1998 年 9 月 9 日，台北寓中）於 1949 年初自家鄉山東高密逃難至青島，後從軍來台，由於自小為「莊稼人」，他對台灣當時的理解便多由對農村的觀察為起始，他這方面的判斷基礎為「當時看到台灣農人騎腳踏車去田裡工作、田中有灌溉溝渠、田裡極乾淨...我們家鄉髒亂的很」。

非常之矮非常之小，而且那個窗子最小，我們湖南省的房子都是木頭蓋的，至少有兩層樓，窗戶大大的...我跟部隊來到以後對於這個香蕉感到很奇怪。這個水果吃起來真是蠻好吃的。我就一直吃香蕉，就把肚子吃壞了，因為這個水果我覺得滿稀奇的，我們湖南省沒有嘛，味道口感又蠻好，我連飯都不吃，結果把肚子吃壞了，拉痢，在軍隊拉痢是不行的啊！

至此我們可見奇異的時—空、將行未行之行動、流亡中乍興的感官經驗、對過去情感性地自我再現方式、以及一肉體不復抑制的「食用 / 佔有」（consume）慾望彼此間互相形成（mutually constitutive）的建構機制，而此互動之機制又與一對主體參與過去及未來的想像絲絲相關。在下一節，筆者將進一步申論前述象徵與情感建構的基礎，對於某些五零年代的文人對過去——特別為國 / 共對峙形成的起因——會引發何種深關身體、以及性別的理解或想像。

參·無盡止的懷念——戀物的共匪，怪胎的情感

對不少五零年代文人言，其對當時在台灣個人主體建構的理解奠基於一前此（即在大陸之時）「主觀個人」與「客觀歷史」間相互辨證的關係上。如，原籍山東，後任軍職，曾任新聞局主任秘書的張騰蛟於其早期（1968）的作品中直書其主體形成、與其所理解之歷史性之間互相辨證的關係，這個關係對張的重要性聚集於他使用「文字」這個再現體系的方式：

投生在這個戰亂的年代裏，我沒有太多的機會去接受教育，兩年小學與一年半的初中，僅僅能使我不再「文盲」而已，用這一點點本錢去從事寫作，顯然是過於單薄與脆弱。所好的是，戰亂雖

然剝奪了我受教育的機會，同時它也給了我某種程度的智慧與毅力，使我懂得如何去自我教育；如何去充實那些流浪的日子。

試著寫作，是從二十歲的那年開始〔註：即為1950年，張隨軍來台的下一年〕，在一種狂熱的情緒支持下，我曾經在「詩」的身上投下了十年的歲月，直到四十九年我的「海外詩抄」出版後，對於詩的熱勁才慢慢消失，自那以後，我已深深的體會到，有些東西是無法用詩來表達的，於是，我試著選擇了新的路子。

我常認為，作為一個文藝創作者，對於他的作品，應該賦予兩種使命；一是藝術的；一是時代的，而且，在兩者的比重上，不該有過多的偏差。我也常常認為，一個文藝創作者，對於時代和社會，應該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因此，落墨之先，就要考慮倒是為何而寫與為誰而寫的問題，也就是要考慮到；你將要給予這個社會的，是一些什麼？將要給予讀者的，又是些什麼？我這個薄薄的集子，就是懷著這種警惕下筆的。（張騰蛟 1968：1；黑體處由筆者所加）

對張及當時許多文人（特別是與張境遇類似的「軍中作家」與「流亡學生」）而言，戰亂與流亡不斷變遷的過程取代了正統教育，提供了另一種如張所言「充實」自我的論述場域。於此場域中，一種類似「狂熱」的情感被生產了，非得以某種特殊的再現形式予以抒發、激揚、抑或掩蓋不可¹⁶。筆者認為，隱含此情感運作模式之後

¹⁶ 對張而言，此再現形式為「詩」的書寫；原因就其所言為詩遠較其他書寫形式「精練」；而在歷經十年詩的創作後自覺無法再有理念的創新，便轉向據其所言與詩的精練度類似、但理念闡釋更清晰的散文。相關對詩、散文、小說間敘事形態與書寫主體創構性、抽象思惟之形塑方式、及真實—再現關係的看法廣見五零年代此類文人；至於為何書寫敘事對其內韻前述的價值與分類標準，當然是一個值得探究與分析的課題。

的，為一特殊的對真實—書寫自我—再現間關係的認知與實踐，透過此認知—實踐的創構過程，主體性得以形成，而以辨證關係進入主體形成過程的「它物」亦得以被建構、且被賦予價值及意義。以《旋風》(1957[1959])及《重陽》(1961)等「反共文學」被夏志清(1979)喻為「五四文學傳承者」、並獲得1978年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的姜貴(1957[1959]:1-2)，於來台後第一本小說著作《旋風》的自序中，將前述主體、感官、物、及記憶之間的關係對其之意義闡釋地頗清楚；有趣的是，在此，這具轉變書寫主體情感創構能力（故亦激發一嶄新的敘事方式）之「它物」竟是1949年10月後於台灣通稱的「共匪」：

三十年來，我寫過五個長篇小說。二十歲的時候，我寫了第一個，那是一個畸形戀愛的悲劇故事。〔下略〕第二個也寫的是一個戀愛故事，〔下略〕這一篇，題名為「白棺」。

民國十六年，我在漢口親眼目睹了共產黨那一套以後，第二年回到南京，那記憶歷數年而猶新。二十年，我寫了我的第三個長篇「黑之面」。我以為共產黨是屬於「光明的反面」的東西，必無前途可言。〔下略〕

張的解釋出於1998年9月初於台北張寓中的訪談，亦見於其於某散文自選集的「自序」（1989）：

我之迷嗜散文的創作，是因為它能容許我在它的身上實驗一些創作的理念和技巧，像是適度的誇張、有限度的抽象、技巧性的含蓄，以及象徵手法和想像力的運用等等。當然，它還在文字魅力與音樂性的發揮上，給了我足夠的彈性和空間，讓文字們有一個飛躍跳動的機會。

文字為何可脫離書寫主體進行「飛躍跳動」的活動，顯然為一值得分析的主體—物的互相創構現象，但囿於本文篇幅之限制便不再多談。

三十七年冬，避赤禍來台，所業尋敗，而老妻又病廢，我的生活頓限於有生以來最為無聊的景況。回憶過去種種，都如一夢。而其中最大一個創傷，卻是許多人同樣遭遇的那「國破家亡」的況味。由於三十年來所親見親聞的若干事實，我想我應該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我將我整串的回憶，加以剪裁和穿插，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即於每晨四時起身，寫兩三個鐘點，四個月內從無一日間斷，我的第五個長篇，便於四十一年歲首草草完成了。

這「有生以來最為無聊的景況」的形成與其所涉及的情感狀況十分有趣。表面視之，這個「無聊」指的是「無事可為」的情境，造成此情境的起源為「赤禍」、及隨「避赤禍」而生的失業與疾病；但這「無聊」初激發姜回憶的活動，復併合著回憶過程中產生的種種情感模式（如「都如一夢」暗喻的似真若幻、真假莫辨等或悵然、或焦慮的情緒、及隨之再度¹⁷體受的「創傷」）而成為書寫主體創構的原動力，使得姜以持續的、幾近偏執的、耽溺的身體展演活動（「即於每晨四時起身，寫兩三個鐘點，四個月內從無一日間斷」）完成了《旋風》。更重要的是，《旋風》的書寫正源於一強大的消弭前述似真若幻、真假莫辨情緒的慾望，而所謂的真假莫辨指的應為一對真實與再現界分不再的主體經驗。有趣的是，對姜而言，唯有透過書寫再一次肯定「回憶中的過去」（即「個人曾體驗的共產黨真相」）作為現存此刻唯一至上的價值評量標準與形塑本始（ontology），真實與再現的必要分野方可維持，個人的生命才再具意義。簡言之，唯有透過確立共產黨的「真相」，當下的「真實」方有意義、才能

¹⁷ 曰「再度」因姜當然早已歷經「國破家亡」的「創傷」，但經此「無聊」，這「創傷」再一次地、且更加深刻地為其體受。亦即，「再次」的經驗、事後的回溯於此具驗證且真實化主觀體驗的能力。

存在；而唯有如此，主體的時間（以「回憶」為代表性活動）方能與「客觀的歷史」勾聯起來。姜（1961）緊隨《旋風》後寫竣的《重陽》〈自序〉中重申此寫作意圖，並在正文中進一步將這個「本始」凝縮至寧漢分裂、國共分家之前的一小段時間中。國府的正統歷史終於清楚地「印證」了姜的書寫主體；姜對「過去」「創傷」式的回憶終於可與「歷史」達成想像的融合，而此想像的心智活動不僅為其所承認，且被其視為一必要的活化（activate）當下真實—再現區隔（故進一步激發有效、有意義實踐〔praxis〕）的革命行動：

民國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產國際以本黨國民革命形勢，北伐進展之速，實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僅利用武漢左派的組織，和聯席會議的名義，決不能與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達成其毀滅本黨，阻礙北伐之目的。此時他惟有力促汪兆銘由法經莫斯科回國。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發表其共同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這一宣言顯然就是史達林的決策之重申。

武漢以汪兆銘為首的「左派」中央黨部及其政府，其會議完全受共黨份子的劫持，其民眾運動的部門亦都由共黨及其同路人任首長。……駐在兩湖的國民革命軍，其各級政治部大抵為共產份子所把持。各軍之間，更飽受共產黨的挑撥離間，彼此意見無法融合。

實際上，兩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

武漢的左派和中共的內部，到了這時，都發生了激烈的爭議。

武漢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們國民黨部來達到他赤化中國的目的之陰謀和野心

，乃決定分共，而與中共決裂。

這一節書，小標題是「武漢左派的悲劇」。

現在，「重陽」所描寫的正是這一「悲劇」。
(頁3)

歷史小說並不就是歷史，「重陽」的故事完全出於虛構。因此，如果以書中之人之事，證諸當時之實人實事，以求其所以影射，那就完全落空。

我的目的旨在重現那一時代的那一種特異的氣氛，給人重新感受，重新體會，用以「紀惡為戒」而已。或有人以為這個想法有近冬烘，而且為時已晚，我卻不那樣悲觀。胡適之先生一再提及的「功不唐捐」，我相信那句話。

同時我也一直相信，共產黨一定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必須敢於分析它所由產生的那些因素，然後才能希望有辦法把它撲滅。詛咒與謾罵也許能洩憤稱快於一時，實則並無多大用處。至於「諱疾忌醫」，其危害之烈，更不必說了。

反共，需要冷靜，也需要智慧。(頁5)

依其所信，有效且有意義的實踐只有一種，便是「反共」；此實踐的效力與意義來源則為在「冷靜」的心態下、以「智慧」來「分析」共黨坐大之因；而遂行此批判性活動的途徑之一則在藉助書寫「想像性」的過去，卻弔詭地「完全再現」「真實」——所謂「完全再現」指的便是一（暴力地）突破再現—真實疆界的象徵行動。第二重弔詭之處在於，書寫主體又如何能同時以書寫的再現形式重現真實、且又維護稍早所提及日常生活中對姜而言再現—真實的必要二分呢？筆者認為，在姜如此的情況之下，幾乎唯一的出路便在試圖藉由書寫聯繫這「它物」與「情感」—「感官」。如前幾節所引受訪者歷經五十年更勝的回憶，流亡之後新生的「價值」須透過

一嶄新的感官經驗方可被主體認同，而此經驗卻又與一「喪失之物」相關；但在嶄新的情感－感官經驗乍興的過程中，另一全新的「它物」也同時被創構。對前引許多受訪者言，這「它物」或是「香蕉」、「感官」或是「飢餓」（及與之相對的「無可抑制的飽足」）；對於姜言，「國府左派」與「共產黨」（即「我」、「它」）的交接鬥爭過程中產生的全新的情感－感官經驗（即「真實」至上的判斷標的）卻以柳少樵及洪桐業二位男性之間的情慾爭鬥與互動來表達。國際共產組織於意識形態及革命行動上無可抵禦的感染性魅力，於此書中被理解為能於同時間進行的多元言說行動網絡中展演、並操弄論述異己主體位置之能力。書中中共的代言人柳少樵完全征服對方的方式為直接肉體的 S/M 男男性交，而進行的方式為給予洪一個「愛的教育」，這個「教育」始於論述「愛」的真諦，終於「愛」的實踐；論述與實踐並行，旨在闡述「真愛」必奠基於言說與肉體雙向的絕對主從關係；即，此為一單向的、非交換的施予行為，真正的愛人僅為施虐者，受者不僅最初無法了解、且終究僅能模模糊糊地揣摩，並永遠無法複製此權力／性關係，將自我塑造為另一施虐者¹⁸。更重要的是，這個愛與被愛的關係也驗證並體現了生命的精髓——故當小說結尾洪桐葉試圖脫離與柳的關係時，也正是其死亡之契機；而結束其生命者，正是柳本人。柳洪初試男男 S/M 情的這段文本值得全部引述：

柳少樵扔掉那香煙蒂，站起來，抱住洪桐葉，在他的腮上嘴上連連親著。然後推開他，說：

¹⁸ 小說中柳在「食髓知味」後，曾數次欲複製此權力關係於其他人身上，特別為他的妹妹洪金鈴。但連他自己亦詫異為何柳對其的控制如此成功、而他自己卻完全失敗。簡言之，真正的 S/M 關係僅能由真正的施虐者啟動，且一旦受虐者的主體位置確定，便永無改變的可能。

「我們常常教訓我們所愛的人。凡受我們教訓的，一定是我們喜歡的人。我們把我們不愛的任何人，都看得像垃圾，不值一顧，他們不配接受我們的教訓。你明白嗎？」

「明白。」

「你願意嗎？」

「願意。」[下略]

柳少樵嘴上笑笑，又問：「看見你腰上的刀嗎？」洪桐葉點點頭。

「說呀，看見嗎？」

「看見了。」

「它利不利？」

「利。」

「整把刀子插到你的腰裏去，不費事吧？」

「不費事。」（下略）

彭文學把刀遞給柳少樵，鋪好油布，教洪桐葉立在油布中間，從柳少樵手裡接過刀來，立在洪桐葉身後，刀尖從洪桐葉的背後對準他的心臟部位。一邊說：

「兔兒，今天有你受的！」

柳少樵瞪他一眼，驀地立起身，一言不發，就動手了。

.....

一時，事畢。彭文學放下屠刀，把滑到鼻尖上的近視眼鏡推了上去，抹抹嘴上的汗，扶洪桐葉到柳少樵的床上將習。[下略]

柳少樵坐在床邊上，俯身下去在洪桐葉的臉上吻著，

用又短又硬的鬍子在他的腮上摩擦，擦得洪桐葉又痛又癢，推他，他就俯得更緊，一逕並排做了下來。

「小洪，記住，我是愛你的。一切，一切，都由我愛你而起。」

柳少樵親暱的說：「我永遠見不得你背離我。一旦被發覺了你背離我，我就取你的性命。即使取你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你今天已經上了第一課，應該明白了吧？」（頁 93-94）

洪桐葉受「教訓 / 教育」之表面原因在其「背信」於柳，在關鍵時刻未放棄其為法國買辦服務的工作。這個「關鍵時刻」出現在為買辦服務的其它中國工作人員邀請他去嫖羅宋妓女。為羅宋性交易者的女色而背離柳的指示，對柳而言顯然較單純的「違抗組織」更不能容忍，因此採取男男 S/M 的方式「教導」洪何謂「真正的愛」。但究其實，洪自為法國籍女主人修腳、因而醞釀對白種女性身體部位之情慾，至與羅宋妓女——亡國之「白俄女子」對中國被殖民男性的情慾想像空間中顯然佔有特殊的地位——進行買賣式性交，終至自願式的成為柳的性奴隸（二人間這方面的情慾互動於此後仍不斷被描摹），其情慾 / 權力的建構過程顯然絕非僅涉及男 / 女、異性 / 同性之面向，尚應包括殖民 / 被殖民與國族 / 亡國的象徵轉換層面，而這個層面應該與「國際共產」 / 反國族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相關。《重陽》中將國共鬥爭以如此的暴力性情慾關係描摹是相當值得進一步分析的，但囿於篇幅，本文僅再引述張買辦帶領洪嫖妓完後的一段心態描述，以彰顯前述情慾、權力、被 / 殖民、及國家之間的關係：

「[前略]小洪，你喜歡看電影嗎？」

「很少看。」

「范朋克總看過的，你喜歡他嗎？聽說他在月宮寶

盒裡邊把一個拖辮子的中國人當狗熊耍，一定好玩的很，好戲不可不看。」（下略）

白俄男人見纏了半天，沒有纏到一點生意，漲紅了脖子，掙著毯子一氣走了。嘴裏嘟嘟著，大約說的是俄語，也大約是罵人的話。

「亡國的人也真可憐，」張買辦說，「男的賣毯子，領港，女的賣淫。」

「只怪他們從前享福太過了。」洪桐葉說。

旅館門前的人行道上，一個穿紅裙的英國軍官，正掛著一個廣東鹹水妹悠然走過。那個鹹水妹細細高高，黑黃皮膚，畫著細長的眉，赤足穿著高跟鞋，有著一種濃郁的南國情調。洪桐葉心裡一動，覺得這和羅宋女人的肥白，正是一個強烈的對比，而實在各有千秋。（頁 48-49）

先透過直接的肉體接觸（即性交），繼而藉由視覺的感官媒介，洪展開辨識國族差異性的能力，微妙的是，這個對其日後共產黨員身分認同極具關鍵性的差異性最初竟須藉由（表面性化的）女性這個媒介方能展現。小說中段起，柳為求訓練洪「真正的愛」的能力，不斷要求後者以漢人性／別及家庭意識形態之標準而言甚為極端之方式「奉獻」其寡母及幼妹，如，誘二人賣淫。正統親屬結構不僅在國民政府論述系統中為標識其文化及政權正統性的最終指標，並可用來標識所謂無正統性的「匪偽政權」，對流亡者而言，亦是檢驗其飄渺的主體認同的最後一道防線，這一點在上一節對受訪者丙的丈夫無限戀慕母親手織毛衣的分析中已可窺見端倪。而對冷戰時期不分中外的《重陽》讀者而言，其之所以被視為毋庸置疑的「反共小說」，也正因洪「泯滅人性」「出賣母妹」的描述（見，如，Ross 1974）。

那麼，洪桐葉究竟為何心甘情願地進入這個全面性的 S/M 關係、又為何雖數度猶疑自憐但終其身仍無法脫離柳少樵的擺佈，直至死而後已？換一個角度，究竟為何姜貴選擇如此一個「變態」¹⁹的情慾主題以「紀惡為戒」？罪惡為何、須警戒的又當為何？或許更重要的問題為，為何需要如此不懈地、重複地鋪陳這個變態情慾主題呢、這般的書寫形式又形塑了什麼樣的快感？第一個問題很容易回答。《重陽》中明白地交代洪在此關係中得到無比的快感——一種無可言說、姜貴亦未曾解釋的耽溺的快感——雖然這快感之興起完全突然、無可預期；也就是說，不知何故在第一次「教訓 / 教育」之時，洪便即時產生對此權力 / 肉體關係的莫大依戀與依賴。正因此依戀—依賴無可預期及無可解釋（因此暴力地踰越了書寫、甚且任何再現機制捕捉真實的能力），方可被姜貴運用以（弔詭地）再現中國共產黨對「正常人」（即於正統親屬體制中建立性 / 別主體性的「中國人」）壯沛莫之能禦的控制權力。而這也就是為何姜於《重陽》〈自序〉中申論「詛咒」與「謾罵」無濟反共的原因：類似詛咒與謾罵「世俗的」——即可以迅即、現世的論述活動抒發不可解之情緒的——言說行動，對於本質超越象徵體系規範的「真實」（共匪本質）又能奈之如何呢？

這個對「真實」的體驗並不難以了解、且可見諸五零年代許多流亡作家之筆間，對此筆者之前亦曾試圖闡述（趙彥寧 1998a）；但筆者認為更有趣的應為本文之前所欲分析的於無限延伸的流亡過

¹⁹ 這個主題是如此的「變態」，以致就筆者粗淺的觀察，沒有什麼文學批評界的研究者願意、或膽敢提及——雖然這是極奇異的，因為姜貴在全書近六百頁的篇幅中最加著墨的，正是柳洪這個「變態」的關係。

程中所生的情感—感官體受、及其與回憶、真實與再現間的多重形塑關係。筆者認為，在這永須於**事後**重塑過去（並藉此定義當下）的反思批判活動中，如前所述地，一幾近耽溺的貪戀情感產生了，對姜而言，**真實地**體受這情感的感官與身體展演方式不僅在近乎偏執的、日復一日的書寫活動、更在於書寫所謂變態情慾間**再度**確立此耽溺情感的感官性。於此，再現不僅與真實融合，再現（並是想像）的感官方能超越、甚且取代情感，成為流亡主體建構的必要機制。筆者並認為如此的變態（或怪胎）情慾並不涉及既存社會結構中的性／別認同。正因二者的不干涉性，「變態」之情欲方可超越現世的性／別指涉系統（referential system），成為**真正的**變態。最後，筆者將引述姜貴於《重陽》〈自序〉中緊接前引「光明」、「黑暗」關係之文以作本文小結：

而「黑之面」到底寫些什麼，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記憶。兩年前，偶步街頭，看見一家叫做「華的工藝社」的市招，才聯想起「黑之面」的女主角名叫「華的」。「華的」是女人的一種面飾，我們有時在西洋女人的帽子上看見插一根羽毛，現在婦人勒髮也有用與其髮色配合的羽毛的，「華的」大約就是那類的東西。往古男子出獵，獲得珍禽異獸，歸而以其羽或皮獻其所歡，用以示愛。婦人以羽為飾，起源大抵如此，這就是所謂「華的」。「黑之面」寫些什麼，看了這個女主角的名字，也大致可以想像了。（頁 1；黑體處由筆者所加）

後記：若非以下人士於本文寫作過程中的參與及協助，此文必無法完成，故於此一併致謝：筆者三位東海大學碩士班三年級研究生兼國科會計畫研究助理孫慧蘭、吳復華、與曾薰慧不僅直接參與筆者目前之研究、且時時提供可貴的資料與見解。就本文寫作言，筆者特別感謝孫慧蘭自 1998 年六月底至九月中的田野與口述歷史調查、吳復華就台灣戰後政經大事的資料蒐集、與曾薰慧就

五零與六零年代公領域中有關「匪謀」敘事的查證。此外，筆者亦感謝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丁乃非與何春蕤力促此文之完成、且企劃本文的中文標題，其間丁教授且擬定本文之英文標題，何教授並撥冗與筆者探討性 / 別政治、階級、與今日台灣社會結構間的互動關係。最後，筆者亦感謝蔡柏貞於文字潤飾與勘誤方面的協助。

引用書目

- 毛澤東，1977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7。
- 台灣史料編纂小組，1993 《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 I (1945-1965)》。台北：業強出版社。
- 柏楊，1996 《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出版社。
- 姜貴，1957[1959] 〈自序〉，《旋風》。台南：明華書局，頁 1-3。
- ，1961 《重陽》。台北：作品出版社。
- 夏志清原著，劉紹銘等譯，1979 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
- 黃仁宇，1991 《地北天南敘古今》。台北：時報文化。
- 張騰蛟，1968 〈序〉，《菩薩船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89 〈自序〉，《溪頭的竹子·中國文選系列 6》。台北：文經出版社。
- 趙彥寧，1998a 〈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 / 別〉，《第三屆性教育·性學·性別暨同性戀研究研討會》，中央大學英文系性 / 別研究室。4 月 15 日。
- ，1998b 〈試論父系歷史空間性中怪胎情慾化的可能〉。《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第五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頁 197-209。

Freud, S.,1963[1929] “Fetishism.” In P. Reiff (ed.), *Sexuali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Love*. New York: Macmillan.

Ross, T.著，陳森譯，1974 〈論姜貴小說的主題〉。《書評書目》，14期。